

晚明短篇世情小说集《杜骗新书》版本考

牛建强

一 引 子

《杜骗新书》成书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517)之顷^①,作者张应俞^②。张氏“悼虞、夏之久逝,触晚近而兴思。身涉畏途,如历九折之坂;目击伪俗,拟破百忧之城。乃搜剔见闻,渔猎远近”^③,对作为晚明社会变化的负面现象之一的各式骗局作了系统观察,用文学的手法把搜求到的素材剪裁、取舍,缝制出篇幅短小、文字生动、说理深透的世情篇什,以类相归,前后联缀,为人们提供了一部烛照世情、防杜骗术的内容丰富的实用性读物。

全书共有四卷,按骗术类型和诈骗者的身份将骗局归作24类。每个类下都有少者一则、多者八则数量不等的世情小品故事;每则一般一个故事,个别的也有二到四个故事的,如三卷十七类(正文中误为十六类)“奸情骗”中的《地理寄妇脱好种》一则下包含四个故事,四卷二十一类(正文中误为二十类)“僧道骗”中的《服孩儿丹诈辟谷》一则下包含二个故事。^④若将这些处于混然状态的故事离析出来,和其他独立的故事条则一起累计的话,该书共有88则短篇小说。

称它是小说集,是因它包含的作品都是以较生动的文字写成,且有一定的情节性,而作品所涉及到的人物也不一定实有。但它们又有别于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作品所涉及的地名、年代,所

反映的具体事情，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又非杜撰空捏，皆和当时的社会情状相贴近，较形象地状摹出了多彩、真确的明末剧变的社会。因而，它是属于介于文学作品和现实写真之间的一种特殊史料。

目前，对《杜骗新书》的版本问题尚有许多歧见和模糊之处，需加辨析详明，以便充分认识该书对晚明社会研究的价值和有效地利用其中有价值的材料。

二 居仁堂余献可初刻本的遗存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该书的明刻本或影刻本可以说都是继初刻本之后的刻本。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卷首的熊振骥的叙文。初刻本的《杜骗新书》应是有叙文的。书作者张应俞和叙作者熊振骥的关系，从写本上所载熊氏叙所揭示的内容看，应该说非同一般，或可为友朋，或者为师徒。熊氏在叙中述张氏编写此书的意图和书籍命名之缘起甚悉，简直可以说他们两人非经亲磋不能如此：

是集之作，非云小补。揭季世之伪芽，清其萌蘖；发奸人之胆魄，密为关防。使居家长者执此以启儿孙，不落巨奸之股掌。即壮游年少，守此以防奸宄，岂入老棍之牢笼？任他机变千般巧，不越奚囊一卷书。故名曰江湖奇闻，志末世之弊窳也；曰杜骗新书，示救世之良策也。其裨世也甚大，其流后也必远。遂为数语，聊叙其概。^⑤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杜骗新书》的最初名称是《江湖奇闻杜骗新书》，只是在后来刊刻时才改作《江湖历览杜骗新书》的。

包含有熊振骥叙的本子，未见有刻本传世，恐怕只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中收藏的江户初期的写本了。据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的佐野诚子调查，该写本应当是日本江户初期著名汉学家林罗山（Hayashi Razan）的遗藏。书叙和正文中，凡遇人

名、地名和书名之处，均用红笔或单线或双线直书标出；书末有朱笔“罗山考之”字样，故知这些朱笔批点系林氏所为。^⑥另外，熊氏叙的首页上部钤有篆文“林氏藏书”朱印一方，也可印证这一结论。

写本共二册，四卷，款式为9行×20字。封二上的牌记先列出诸类骗局的名称，随后是书坊标记文字“居仁堂余献可梓”七字。可见，这一写本是根据居仁堂余献可的刻本缮抄的。

查检有关书目得知，余献可刻书存世的至少尚有两种：一种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由徐曾瀛所辑的《新镌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共39卷，^⑦为万历间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拟于《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第76辑中影印出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也藏有该书的残本（缺卷一、卷二十、卷二十一）。^⑧另一种是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凡7卷，尚有卷首1卷。版式为9行×20字。卷下题“济南沧溟李攀龙选、公安石公袁宏道校，书林献可余应孔梓”。李攀龙和王世贞在明嘉、隆间共主文坛，李氏乃“后七子”的中坚，后虽有其他文派树帜崛起，但余音仍袅袅未息。万历三四十年代，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堪称诗文领袖，影响所及，风动波起。故李、袁二先生的大名不免被书贾假借，作为骗取人们信任、促进书籍销售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从中也获得了余应孔乃其名、献可为其字或号的信息。该书卷末牌记云“万历戊午孟夏月居仁堂余献可梓”，因知该书刻成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⑨

上述由余应孔（献可）刊刻的两种书籍的年代均在万历年间，其中一个具体时间是万历四十六年。结合余氏所刻《杜骗新书》前熊振骥叙的署时和刊刻版式，我们大致可以获知：万历四十年代，余应孔（献可）的居仁堂在私人刻书业中比较活跃，经营得也算红火；《唐诗训解》和《杜骗新书》大体在同期上版，故行款相同，9行×20字的款式是余氏万历四十年代末的刊刻范式。

王重民先生在《唐诗训解》的刻本提要中还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该书刻本的另一重要线索，即在该刻本的书衣上题有“书林三台馆梓”字样，说明余应孔（猷可）的居仁堂与三台馆有一定关系。三台馆是明代后期福建建宁府建阳县的有名的编书兼刻书家余象斗（字仰止，号三台山人）的书坊，又称双峰堂，自万历二十年代起刻印过大量的日用类书和通俗小说。日用类书较著者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刻的由余象斗编撰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43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刻的由龙阳子编撰的《鼎铨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35卷）；通俗小说如讲史小说《列国志传》、《东西两晋演义》、《唐国志传》、《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等，如公案小说《新刻皇明诸司公案传》等。可见，居仁堂的余氏与三台馆的余氏不仅存在着族属上的关系，而且在刻书范围上也大致相同。

明末建阳的刻书业中，余氏一族的规模和声势令人瞩目，正如明代通俗小说研究前辈孙楷第先生所云，“建阳余氏，以书肆名家，自宋至明，世守其业，凡数百年。”^⑩魏隐儒先生也曾指出，“万历以后，建阳书坊所刻小说、故事、百科全书之类的民间读物日趋增多”^⑪。无疑，万历年间小说类通俗读物乃是建阳余氏刻书的追求和特色，而余应孔（猷可）同期刊刻《杜骗新书》一书则与这一事实是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论：余应孔（猷可）是万历年间建阳的余姓刻书家之一，《杜骗新书》的初刻本即诞生于福建建阳。

三 存仁堂陈怀轩后刻本的面貌

现在见到的《杜骗新书》的刊本是存仁堂陈怀轩的刻本。该刻本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的内阁文库均有收藏。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入《古本小说集

成》。大连图书馆藏本，据说“无序，行款全同于日本内阁文库本”^⑫，当也是陈氏刻本系统。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本子实际上也属于陈氏刻本的范畴（其中的某些小异系人为所致，下有详述）。

将存仁堂陈怀轩刻本与依据余氏居仁堂初刻本的江户初期写本比较，可以看出：两本在二封上所列出的诸类骗局名称、目录和正文的版式、文本的卷帙和内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依据余氏居仁堂刻本而成之写本的二封上所列的骗局后的“居仁堂余献可梓”，在陈氏刻本上被“存仁堂陈怀轩梓”所替代；写本上的熊振骥叙在陈氏本上缺省；正文卷一、卷二中所署的书林（即书坊）名称在陈氏本中被挖去，成为“书林 梓”的样子。如前面所云，熊氏叙应是初刻本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此，我们说存仁堂陈怀轩的刊本是对居仁堂余献可初刻本进行了局部的剽改。^⑬据孙楷第先生载，他曾从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那里得知，日人中有收藏《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情公案》一书6卷足本的，署题陈眉公（继儒）编，封面题“存仁堂陈怀轩刻”。^⑭可见，存仁堂陈怀轩也是一个通俗小说刊刻、传播的有力推动者。由于目下材料的限定，陈怀轩的籍贯和生平尚不甚详明，留待以后搜考。

存仁堂陈怀轩刻本正如上述，与居仁堂余应孔（献可）刻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陈氏本的特征同样也适合于余氏本。因陈氏本已有影印版行，兹围绕陈氏本来说明《杜骗新书》的面貌。

I. 从版式上言，每半页9行，行20字。

II. 从结构上看，本书采用“卷”下设“类”，类下辖则（或条）的办法层层统摄。全书共分4卷，凡24类：前2卷各有7类，共14类，包括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露财骗、谋财骗、盗劫骗、强抢骗、在船骗（封面云“船中骗”）、诗词骗、假银骗；后2卷各有5类，共10类，包

括衙役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拐带骗、买学骗（封面云“黄缘骗”）、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引嫖骗（封面未列此类）。

Ⅲ. 从内容上讲，存在着三个问题：

（1）书名称谓前后不统一。目录、卷三、卷四的书名为《新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卷一、卷二的书名为《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这种书名不统一的现象在古代小说的刊刻中极其普遍。

（2）目录篇目和正文篇目的歧异。首先是文字差异（显系误刻如以“金”为“全”者除外），列表如下：

归属卷类	目录篇目	正文篇目
一卷一类 脱剥骗	诈称偷鹅赚青布 借他人屋脱客布	诈称偷鹅脱青布 借他人屋以脱布
一卷二类 丢包骗	丢包于路行脱换	路途丢包行脱换
一卷六类 牙行骗	贫牙脱蜡还旧帐	贫牙脱蜡还旧债
二卷十类 盗劫骗	诈脱货物劫典当	诈脱货物劫当铺
三卷十六卷 婚娶骗	青蛙形出谋害情	因蛙露出谋娶情
三卷十八类 妇人骗	哄婢成奸骗油肉 三妇骗脱三匹马 尼姑撒珠为奸媒	哄婢成奸骗油客 三妇骗走三匹马 尼姑撒珠以诱奸
四卷二十卷 买学骗	哄封银以砖换去 寄银店主被拐逃	诈封银以砖换去 银寄店主被窃逃
四卷二十三类 法术骗	和尚诈照形谋反	法水照形唆谋反

其次是篇数差异。目录中漏列三卷十九类“拐带骗”中的《太监烹人服精髓》和四卷二十一类“僧道骗”中的《诈称先知骗绢服》二则。^⑮再次，在目录中单独列类而被称为二十四类（即全书

的最后一类)的“引嫖骗”，在正文中却是以只列则名(该类仅一则《父寻子而自落嫖》)、在则名下用小字注出“附引嫖类”的方式出现于“法术骗”中的《摩脸贼拐带幼童》一则之后。

(3) 正文中类的序号的错编。从三卷开始，应该是总类顺序十五类的“衙役骗”却被编作十四类，此后的诸类序号依次沿误。因应为二十四类的“引嫖骗”于文本中未以类的形式单独列出，故在正文中所能见到的总类数只有22类。究其致误原因，可能是在初刻本刊刻时，前2卷和后2卷分别由两个刻工操作，他们采用的区别类的格式不同：前2卷是以“一类××××××”的形式界分诸类，后2卷则是以统编序号的方式次第诸类。可能由于最初未能核清前2卷类序的总数，遂使后2卷的统编序号自三卷始一误再误，通贯始终。而上面所述的一、二卷书名相同，三、四卷书名也相同，而这二组书名却又相异的事实，也可作为推测该书系由两个刻工刻成的佐证。

四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的变动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双红堂文库也收有《杜骗新书》一书。朱眉叔和董莲枝二先生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所收的《杜骗新书》的标点本的《前言》中云：“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有一部，为张怀耿梓。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首有叙，署万历丁巳年春正月之吉三岭山人熊振骥撰。”佐野诚子就此问题作了专门调查，结果显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除了近年购置的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该书的影印本外，在先前故藏的双红堂文库中确收有《杜骗新书》一书，且只有一种版本。但这一藏本并非张怀耿梓行；半页版式也非10行×20字，而是9行×20字；书首也无熊振骥叙。因此可以肯定，朱、董二氏并未亲见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藏本。他们或许是根据什么线索把了解到的日本内阁文库所收写本的某些特征误

记到了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本子上了。

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的上述主要特征和存仁堂陈怀轩刻本相符，因此它是属于后刻本系统的。但将它与陈氏本比勘之后，我们发现，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的目录内容却有别于陈氏本：一是目录中的书名，陈氏本题作《新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而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则题作《杜骗新书》；二是上面曾经说明，在陈氏本中，存在着若干与正文篇目相歧异的目录篇目。据此对核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的目录，结果表明，大多卷、类的歧异篇目都如陈氏本，而唯有从一卷一类“脱剥骗”到同卷六类“牙行骗”所涉的四则不同。从这二处差异出发，是否就可轻率地作出东洋文化研究所本子非陈氏本系统的判断呢？答案是否定的。

从一卷一类“脱剥骗”到同卷六类“牙行骗”共占2个半页，即一个版心页，同属一版。古代版印系手工操作，由于版片多次使用的磨损，或版片着墨的不匀，常常造成刷印文字墨色浓淡的不一，甚至留下版框连带沾墨的痕迹。这种现象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目录的前2个半页上则看不到，相反，倒是其手写特征非常明显。佐野诚子为了确证这一事实，又亲自找到原本（在日本，一些藏书单位为保护古籍善本起见，通常将其拍照复印制成拷贝本用以阅览），观察目录的前2个半页和后面的用纸有无差别后果然发现，这2个半页的用纸和后面的纸张不同，比其他部分要好一些。因此可以综合推定，该藏本的前2个半页目录最初可能系残缺，由收藏者根据正文的篇目和目录的刊刻格式而补写上去的，因此造成与陈氏本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它系陈氏本系统的结论。

现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的一卷七类中的《引赌反落人术中》一则残存3页，不为完璧。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朱、董二氏的标点本^⑥上也只字未有。然不无有幸，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上此篇却完好无损。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的残缺部分实际上只有半页，即该则的按语部分。现

据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内容补录于下：

按，好赌者落入圈套，何止若是。鄂（指张鄂——引者注）犹是有本富商，故不尽取，而又善处于终，致戒其后。若是赌场中光棍，何怕你万贯家财尽落伊手乎？睹徐华胜之输而返悔者，后人鉴之，可勿蹈矣。

五 结 语

综上考论可以看出，《杜骗新书》存在着初刻本（以写本形式体现出来）和剗改后的刻本两系统，后一种刻本的诸藏本也各具特点：

（1）《杜骗新书》的初刻本应是余应孔（献可）的居仁堂所刻，如今已无原刻，但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的江户初期的写本中仍留下了影子；其前有熊振骥所作叙文，为该书形成背景的了解、刊刻时间和格式的把握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2）陈怀轩存仁堂的后刻本所做的只是将初刻本的几处书坊标志挖去和改易，将初刻本前的熊氏叙取消；这些是有异于初刻本的地方。属于这一系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依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的影印本，中有一则残缺。

（3）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目录的前2个半页系藏书家后来所补，故和原刻稍异，然仍属陈氏本9行×20字的后刻本系统，且书中所载诸篇文字完好无缺。

兼顾上述各本构成，把相关部分抽取、缀补、重组，使其完璧；依据熊氏叙恢复书籍的原初名称；再比较目录与正文歧异篇目文字的优劣，决择去取；将该独立的类目从附属的形式下解脱出来。这样，我们非但可复原出初刻本来，而且复原之本将更为科学和更加符合撰作者的初衷。

[附记] 在该文撰写过程中，承蒙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岸本美绪教

授和人文社会研究科佐野诚子君的帮助，于此敬致谢忱！

注：

①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有该书江户时代初期的写本，书前有熊振骥为该书所作序文，末署万历丁巳年春正月。

②《杜骗新书》卷一、卷二所署作者名字前的地望为浙江。这一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考实。

③内阁文库藏江户初期写本《杜骗新书》卷首，熊振骥：《叙江湖奇闻杜骗新书》。

④曹中孚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中所收的依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存仁堂陈怀轩刻本的影印本的《前言》中把上述二则中所包含的故事数目给弄颠倒了。

⑤见前揭江户初期写本内所载熊氏序文。

⑥按，林罗山生于正亲町天皇天正十一年（1583，明万历十一年），卒于后天皇明历三年（1657，清顺治十四年）。京都人，名忠，又名信胜，法号道春，又号罗浮子。初为建仁寺僧，很早即有志于朱子学，因成为日本著名儒者藤原惺窝的门人。后阳成天皇庆长十年（1605）即在他23岁时，受招出仕于幕府将军德川家纲，充任过四代将军的侍讲，并起草外交文书和各种法度草案，为幕府整顿作出了贡献。宽永七年（1630），于上野的忍冈建立家塾，这是以后昌平坂学的起源。他曾批点和刊印《大学抄》、《大学解》和《论语解》等汉籍；试图寻求朱子学说和日本固有信仰的调和，从朱子学角度叙述日本史，著有《神道传授》、《本朝神社考》、《本朝通鉴》等（参考高柳光寿、竹内理三主编《日本史辞典》，角川书店昭和四十九年第二版，782页）。

⑦见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第531条，《余献可》。

⑧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昭和五十六年订正缩印本，子部第十一，类书类一，汇考之属。

⑨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集部一，总集类，461页。

⑩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五，明清部四，公案类，《水浒传》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⑪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二编第十三章：《明代的刻书事业》，第三节：《坊刻本一》建阳书坊。

⑫见《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五册收入的朱眉叔和董莲枝二先生在标点本《杜骗新书》中所撰《前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⑬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七章：《古书版本鉴定》，第二节：《依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中说，中国雕版古书所用版片多系枣、梨，木质坚硬，故可保存、延用许久，其间难免易主。版片主人更换，牌记也就随之而变。

⑭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六，附录，子部小说，《新锲国朝名公神断详情公案残存三卷》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⑮按，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收入之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杜骗新书》影印本《前言》云，该书目录列出83则。误，实际上只有82则。

⑯对于朱、董二先生的标点本，我们有以下看法：（1）对在整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底本未做交代，这不符合古籍整理的一般要求和习惯。（2）该本目录篇目与正文中篇目基本吻合，显系在整理时经过调整，也未予说明；整理本书，应出校勘记而未出校勘记。这样，容易使未见到原刊本者误以为原本即是如此。（3）在未亲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的情况下只求臆断，致使甲乙颠倒，使人对该书的版本形成错误的概念。（4）因校对未审，致多处错误产生。仅以目录为例，一卷一类“脱剥骗”第四则《遇里长及脱茶壶》中的“及”应为“反”，正文中也复如是；一卷四类“诈哄骗”第四则《诈以帚柄耍桥夫》中的“桥”应为“轿”；三卷十八类“妇人骗”第一则《哄婢脱奸骗油肉》中的“脱”应为“成”。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